

徐
泓

大 人 物

·
小
人
物





大人物·小人物

徐泓

责任编辑:刘振声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任宗英
责任校对:王 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人物小人物/徐泓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ISBN 7-01-002262-3

I. 大…

Ⅰ. 徐…

Ⅲ. 人物-特写(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K825②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938 号

大人物小人物

DA RENWU XIAO RENWU

徐 泓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212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01-002262-3/K·487 定价:15.00 元

序

张 洁

天下有才情的女人不少；

天下有风度的女人不少；

天下品味高的女人不少；

天下漂亮的女人更不少，不但不少，还可以说是很多。随便选出一个电视频道，或翻开一本杂志，都能享受到“开卷有美”、“开机惊艳”的乐趣。

但是气度不凡，既有才情、又潇洒漂亮的女人可就难找了。

我见过的、有点说道的女人不算很多，可也不能算少。难免就有凡事难以两全的遗憾。

我不能说徐泓就是如此完美的女人，但说她是一个如此标准的女人恐怕还不为过。

初识徐泓是在一个例行的会议上。那是一个可上新“儒林外史”的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站在楼上，带着终于卸了妆的索然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等着上车回城的人们。当时站在那个楼层上和我一同凭栏下望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徐泓。

一旦经历的太多，就是相熟的景物也很容易忘记，更不要说

是初次相见的情景。我也不明白怎么就很牢地记住了那个徐泓。

所以我相信缘份。

以后在北京政协办的杂志上看到一份介绍北京四合院的文章，一看就看出它对我日后的用处，便剪下存起。我留意了一下作者的姓名：徐泓。

渐渐地，我越来越被徐泓所吸引。

相信拜倒在她的气度、才情下的男性也不会少。

在中国，记者是一个相当难做的职业，而做一个有个性的记者就更为艰难。

徐泓却在这方寸之地上做出了声色。

像这样一个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人物、民俗等方面都有深刻见解的记者实在不多，从这本集子所选的篇目读者便可领略一二。

收书的篇目虽多为人物专访，但却没有“翻炒”名人花边新闻的媚俗，我想这恐怕也是大记者和三流记者的一个分野吧？

如此，徐泓会不会成了一个“人干”？

她决不。

购物、服饰、装扮也是我们一旦有点时间便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供我们这样讨论以及实践的机会太少。我们只能这样地说：“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在我前不久的生日那天（要不是她提醒，我自己倒记错了日子）我们终于同去逛了一次服装城，她的收获不小。

钢琴在她指下也能发出“星”们决弄不出的轰鸣，完全古典的、有过正规训练的。这是因为有过一位钢琴教授的慈母，两只手自然也很有弹琴的气魄。

她的成功当然首先来自她的敬业精神。现在找热爱钱的人不难，找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人就不容易了。更难说为理想而献身。不过按照我的想法，最好是又热爱本职工作、又爱钱。

我们难得见面，她无时不在忙着跑新闻、跑采访。其中很多并非她工作的必须，而是一份本可不必介入的人事态度，当然也就是人生态度。

可能还有一个让她忙上加忙的原因，无论事务怎样繁杂，晚上一定要赶回北大去照顾陪伴失去爱侣的老父。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我就分外自谴。相比起来，我对母亲的照顾就太不周了。可是母亲已经不能死而复生，我只能抱恨终天。

在这个只具备某种社会形态初级阶段的环境里，她仍然保持着待人待事的敏锐、魄力、热忱、正直、通达，而没有传染上在一个不算正常的环境里、很容易传染的毛病，自然因为她有抵抗这些毛病的品格，而这些品格，也正是一名优秀的记者须臾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她还多出一份也许是不必要的温情和善解人意。

可是真要将这些品格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谈何容易。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事情成败的关键要看时间、条件、地点给与的默契。很神秘、也很宿命的。谁能分析得一清二楚？如果能说出子、丑、寅、卯，人间的很多事物就可以在工厂里制造，如果嫌弃工厂不够神圣，挪到实验室里也行。

一个人的造就又何尝不是这样？

再找一个“徐泓”，

难了！

徐泓是我的朋友。

不过当初她并不因为我是张洁才和我交朋友，现在也不是。

她用得着吗!?

我也并不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才说她的好话。

相反，正是因为她有这么多可说的好话，我们才成为朋友。

目 录

- 序 张洁(1)
- 周恩来的家事心事身后事 (1)
- 邓颖超未公开的遗嘱 (22)
- 女子到此是豪雄 (28)
- 记吴仪
- 邓小平的牌友王大明 (54)
- 成亦英雄 败亦英雄 (60)
- 记张百发
- 她的昨天和今天 (79)
- 记何鲁丽
- 七号楼断想 (86)
- 追记许士杰
- “对着文字,我找到了自己” (92)
- 记女作家张洁
- 龙应台北京行 (97)

目 录

- 王朝柱的宏图大计 (107)
- 天上人间魂梦牵 (115)
- 端木蕻良忆在港岁月
- 影视求神似 生活惟本色 (124)
- 王铁成印象
- 为中国“茶花女”张权送行 (127)
- 魂归故乡山与水 (130)
- 沈从文先生骨灰安放记
- 记凌叔华的最后日子 (134)
- 超凡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143)
- 智者剪影 (151)
- (梁漱溟 金克木 邓广铭
吴组缃 朱光潜)
- 赵玉芬的女儿情 (164)
- 曲成只自知 (172)
- 记厉以宁
- 揭开一个历史的盲点 (176)
- 记我国第一位留法文科女博士张若名
- 黄万里:水利界的不同“政”见者 (189)
- 他家与毛泽东结了儿女亲 (193)
- 孔从洲家庭访问记
- 杨虎城的遗孀和儿女 (202)
- 末代皇姑与国舅的金婚 (211)

目 录

追记龙四公子	(220)
“马克西姆”女主人的异国恋	(229)
默默银杏情	(238)
——记郭沫若的后人	
土味儿 洋味儿	(241)
——记我的三个小侄甥	
文人与四合院的京味儿	(248)
北京的川菜与领导人口味	(258)
京华万花筒	(267)
陵园：人生百态又一处	(275)
“爱士”：中国“杨百翰”	(284)
北京“摇滚”录	(293)
北京若瑟修女院探秘	(304)

周恩来的家事心事身后事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当了一个大国的总理 26 年之久,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的遗产。当他的夫人邓颖超 1992 年夏天与世长辞以后,这点更加得到了证明。

这位与丈夫同样德高望重的老人留下了一份遗嘱,即那封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她还留下了一份委托书,指定 6 个人在她身后处理遗物。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就是这 6 个人中唯一的家属代表。

“七妈的遗物主要是书、文件、信件、她和伯伯的照片,还有一些衣服、杂件等。”因为周恩来在周氏家族的大排行里行七,侄辈都称邓颖超为七妈。“她在委托书里一共列了 7 条,如何处理交待得很详细,其中衣物、杂件中有一部分,七妈讲明给有来往的亲属留念使用。”

当周秉德在她的《华声报》副社长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时,邓颖超身后事的办理已告一段落。“伯伯和七妈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而去,他们没有任何遗产,存折上最后留下的一万元人民币

也全部交了党费。”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字同宇)的长女。周恩来夫妇无子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在亲属中她与伯父伯母来往最密切,时常去中南海居住和探望,邓颖超说过:“老大秉德和我们的感情深。”或许这是她在亲属里指名周秉德参与遗物处理的原因吧!

随着两位伟人的离去,周秉德终于打开了珍存在她心里的回忆:

1949年,邓颖超拉着一个圆脸庞小姑娘的手说:

“你就是小秉德呀,你好!”

“我在天津上的小学,一毕业父亲就把我接到北京来了,是伯伯和七妈要我到北京来念中学的。当时我们家还没搬过来,父亲在华北大学受训,我随着伯伯和七妈住。

大约6月中旬吧,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丰泽园,那时伯伯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园里。现在参观毛主席故居,不是有些大房子吗,然后往南走,出来的时候最南边的一个小院,就是伯伯和七妈的住处。这个中式小院没有翻建过,至今还是原貌,挺破旧的。我住在西厢的一间屋子里,对面住着伯伯的两个秘书杨超和罗迭,他们是一对夫妻。我见伯伯就在这个小院里。”据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12岁的周秉德刚到丰泽园时,周恩来正在外边开会,回家见到她,高兴地把她拉到身边,左看看,右看看,问她的年龄,又问她留在天津的妈妈、弟妹们可好,然后向成元功交待了给侄女安排住处,才去埋头工作。

周秉德与邓颖超的初次见面，不在这个小院里，而是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时邓颖超奉毛泽东的派遣，专程赴上海迎接宋庆龄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秉德随周恩来乘车到火车站，然后被叔叔们领到欢迎的行列里。邓颖超在人群中看到了这个圆脸庞、大眼睛的小姑娘，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呀！你好！”43年后讲起当时的情景，周秉德似乎仍能感到邓颖超慈蔼的目光和不褪的手温，她感慨不已：“七妈就在我的眼前，一切都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中南海里，6个小姑娘学骑车，学跳舞，
还请毛泽东一起喝鱼汤。

1949年的夏天，在周秉德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她来到伯伯和七妈的身边，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她说：“我的房间里放着不少书，解放区的呀，苏联的呀；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其他的时间呢，我就和新交的几个小朋友一起。一个是毛主席的大女儿娇娇，她当时还没起李敏的名字呢；还有叶子龙的两个女儿，一个叫燕燕，一个叫二娃子，再有一个朱老总秘书的小姨子，后来又加上了李讷，她的妈妈带她从苏联回来了。就这么6个10岁上下的女孩子，到处跑。李讷从苏联带回了两部小自行车，我们就在宽敞的春藕斋里学骑车。到礼拜六，这里开舞会了，我们又跟着大人们学跳舞。”

讲到这里，周秉德的双眸闪动着快乐的光波，她仿佛回到了自己幸福的少年时代：“丰泽园前边很近就是南海，水里可以捞到一寸左右的鱼虾。我们有时到海边去摸鱼摸虾，当捞到够做一

盘汤那么多的鱼虾时，我们拿着它们去找毛主席：‘毛伯伯，毛伯伯，我们又捞了点鱼虾，和你一起吃饭！’毛主席很随和，随声应道：‘好，那你们就来吧！’我们把鱼虾送到厨房，作为我们的‘进贡’，于是这顿饭就算毛主席请我们吃了。毛主席餐桌上的饭菜挺简单，他特别爱吃苦瓜，而我们谁也不爱吃，他批评我们：‘从小就要学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她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纪念册，挺神秘地告诉我：“对了，毛主席还给我留过字呢！”这是小学毕业前她手工课做的本子，把各种彩色打字纸钉在一起，找了一块墨绿缎子，塞点棉花，包了一个皮儿，如今封皮和内页都褪色了。翻过数页同学和教师的留言，几个熟悉的遒劲的字体跃然纸上：“好好学习毛泽东”。

“那时候我哪儿懂啊，让毛主席题字应该专门准备金贵的本子，我就拿着这个本儿跑去了：‘毛伯伯，你也给我写一个吧！’‘好！写一个！好好学习！’毛主席答应得很爽快，他提起笔一挥而就。”

周恩来再三交待：“周同宇的职务 要安排得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9月里周秉德考取了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周恩来委托秘书帮助她备好了全套行李，送她去住校。那时她在校内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只有周末才回到中南海。1949年11月成立政务院以后，周恩来夫妇搬到了西花厅居住和办公。“我家已经从天津搬到北京，但住房窄，弟弟妹妹又多，所以我和大弟弟、妹妹

还是住在伯伯、七妈这里。”

周秉德在中南海一直住到她参加工作结婚为止。我问她：“你在总理夫妇身边长大，家里是否提到过‘过继’的问题？”

“我爸、妈向伯伯和七妈都说过：‘你瞧，我们有6个孩子呢，把哪个过继给你们，由你们挑。’伯伯七妈的想法很明确：‘我们一生都是干革命的，全中国的少年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不用专门哪个孩子归我们，你们的事，该关心的我们都会关心的。’这样就没有明确谁过继，但伯伯七妈给我们姊妹弟兄6个人每人一笔生活费，从1950年一直到1969年，我们相继参加工作为止。这笔钱每个月都是我向伯伯的卫士长成元功去领，先是120元，后来是200元。为什么伯伯给我们家这种固定的帮助呢？这要从我爸爸说起。”

周恩来弟兄3人；他居长，二弟恩博，1945年去世了；三弟恩寿就是秉德的父亲，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来在9岁那年丧母，从此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他们相依为命，手足情深。周恩来后来追随着哥哥到沈阳、天津读书，还进过黄埔军校，1927年他脱离政治转而经商。

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商人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建国前夕，他被送进华北大学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周恩来后来一直用同字的名字，毕业后先分配到冶金部钢铁工业局，不久又转到内务部。周恩来对他唯一的亲弟弟工作的安排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周秉德说：“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在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后来还是内务部长曾山的儿媳妇告诉我，她的公公在聊天时说过，总理的弟弟刚调到部里时，总理曾再三交待：‘周同字的工作，要安

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来我父亲患胃溃疡，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休养，不能正常上班，伯伯就让他提前退休，并叮嘱内务部办手续。曾山没当回事，以为总理只是表个态，拖了一段也就忘了。但伯伯根本没忘，见了面就问，甚至提出批评：‘你再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不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大约在父亲提前退休后，伯伯给我们每月的补助增加到200元。伯伯就是这样，宁可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也不让组织照顾。不光我们一家，我的二伯母，他们母子俩在河南焦作，生活也不宽裕；还有在淮安老家的八奶奶等亲属，生个病啊，有个事啊，谁家里有点难处，伯伯都管，为的是不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

西花厅里有严格的家规，也有温馨的亲情。

有一篇文章说，周总理给他的亲属定了10条家规，我问周秉德是否如此，她说：“我不知道有这么10条，但是伯伯和七妈对我们各方面确实有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也可以算作不成文的家规吧！”

“伯伯在公与私方面界限分明，也极细心。1949年我刚从天津来时，秘书们带着我到王府井做了两身卡叽布衣裤，一身蓝、一身黄。我高兴地穿着蓝的那套走出来走进去，伯伯看见了，问：‘这是哪儿来的衣服呀？’我说：‘叔叔带我去做的。’过了两天，伯伯看到我又换了那套黄的，马上问：‘怎么做了两身呀！’因为不是花他自己的钱，而是花的公家钱（当时是供给制）；他觉得做两身太奢侈了。

他和七妈不准我们有任何特殊化，七妈经常讲：‘你们要靠自己奋斗，不能靠伯伯的关系而享受不该你们享受的待遇’。我在女附中读书时，看到班里有的同学每到星期六就被小汽车、吉普车接回家；我去问七妈，七妈说：‘你应该坐公共汽车或者骑自行车，你伯伯的车是他工作的需要，怎么能专门去接送你呀？’从那个时候起，三十多年我一直是骑自行车出入中南海的。上学时每到寒暑假，我在西花厅住的时间长了，七妈就要求我到大食堂排队买饭买菜，不再吃小灶。我参加工作以后，七妈为我和妹妹秉宜在中南海家属宿舍楼里找了一小套房子，但她申明，要由我自己出租金，她说：‘不是我和你伯伯拿不起，而是不能养成你们依赖家庭关系的习惯。’”

周秉德话锋一转：“当然，除了严格要求，伯伯和七妈与我们还有充满了亲情的那一面，我觉得过去的文章这方面讲得不够。”我说：“那么你能否谈谈你印象里的伯伯和七妈呢？”

“伯伯日理万机，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忙，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他的卫士比他年轻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着他。我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1950年有一段时间，七妈身体不好，住在颐和园里休息，伯伯有空时就去看她，如果我在，就带上我一起去。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他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我还和伯伯跳过舞，他跳得极好，步子又稳又清楚。对了，伯伯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灿若云霞，他都分外高兴。

和七妈在一起有更多亲人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她去世以后，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当年她带我去中南海里划船的情景。那